



前一段时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师从众师”有感》，谈到上世纪50年代，沈昌文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在1954年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他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出版人，如胡绳、叶籁士、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史枚、范用、戴文葆、冯宏符、张明养、梁纯夫、王仿子、徐律、戈扬、金敏之等，还有许多文化名流，如刘仁静、何思源、朱南陔、陈玉祥、舒怡上、董秋水、郭根、谢和康、应德田等，还有许多优秀的著译者，如游国恩、邓广铭、萧珊、周建人、叶笃庄、凌其翰、陈寅恪、邓拓、吴晗、贺麟、夏曾佑、翦伯赞、吕振羽、郭从周、邓之诚、唐长孺、罗尔纲、王荫庭、李剑农、王以铸、施咸荣、黄雨石、宋云彬等。那时年仅二十几岁的沈昌文不但为他们服务，还跟他们学习读书方法，学习做人做事，为自己打下一生的工作基础。所以后来沈先生经常会说，那六年的经历是他学习做出版的研究生时期。

上文发表后，有读者询问：那六年以及此后六年，除了沈先生自身受益的回忆，还有哪些难以忘怀的书人书事呢？确实有很多，在阅读中我甚至觉得，如果以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缩影，那时的文化出版界，似乎发生着一次深刻的变革，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影响颇为深远。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需要提到沈昌文、史枚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合作编撰的一部书稿，题曰《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这是一部未出版的著作，现存的文稿是沈、史二位亲手刻印的油印本。史枚是一位老前辈，也是1979年《读书》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工作，掌握大量的出版资料。由于这部书稿产生于非常时期，全文运用反语叙事，取义微妙，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许多故实难得留存。此前有些著作如《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曾经引用过这部书稿中的部分内容。现在我们以这本《大事记》为依据，讲述一下人民出版社在那场变革的过程中，几段与选书相关的故事。

看看前辈如何选书

俞晓群

一是“开门办社”，沈昌文、史枚在《大事记》中记载：“五十年代的出版社是不必出去组织稿件的。”但是到了1954年1月，中央转了一个文件《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谈到人民出版社开始改革的几项举措，为此在人民出版社及其副牌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名下，成立六个编辑室。《大事记》记载：“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版改革之后，首先着手拟定人民、三联、世知的三年选题计划，在本市，一口气开了十一场座谈会，向各方面一百多位‘权威’征求意见。在外地，陆续出去六七十个组稿团，去中南、华东、华北三地活动，都由主要领导带队。这一来，组织到不少稿件。由陈原带队的中南组稿团访问了数百个学者，多方设法说服他们，让他们把该出而未完成的半成品整理出来……三联重新对外打出招牌，对内成立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陈原（兼），副主任戴文葆，而且出外组稿。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了三个选题计划，三联的计划影响最大。”那么，有哪些出版计划呢？诸如整理出版中外经典著作，整理出版一些非政治类的有用的书，以及一些旧学者的新旧作品、一些新生代学者的新著等等。举一个例子，据沈昌文回忆：“这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们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跟后来出的‘灰皮书’‘黄皮书’不一样。灰皮书、黄皮书的封面就是灰的或是黄的。这个计划现在还在，一亿两千万字，那真是很大的规模。出的第一本就是《小逻辑》。”（《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小逻辑》黑格尔著，贺麟译，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1959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是“翻箱倒柜”，就是请老学者把手

中的好东西拿出来，出版过的或待出版的书稿，争取交给人民出版社及三联书店出版。《大事记》记载：“一九五四年十月，由王子野带队的上海组稿团，从文史馆和各大学‘发掘’了一大批遗老遗少，如前清探花商衍鎤，黄色文人周瘦鹃，资产阶级学者栾调甫，资产阶级记者陶菊隐，他们的许多著作都在以后陆续出版。”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1957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了陶菊隐多卷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再如刘节《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宋桂煌译《论宗教》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李桃《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曾彦修、陈原等人对这些书极为欣赏，如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被曾彦修誉为“京派”著作，特意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三是“放开手脚”，换言之，就是解放思想。1956年莫尔《乌托邦》在三联书店出版，据《大事记》记载：“出版此类书，有些人一直有顾虑。一九五八年王子野说：‘莫尔的《乌托邦》是名震全球的作品，销售十万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书店要进货，要勇敢一些，不要小手小脚。’”还有一些存在争议的著作，例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再如罗尔纲的考据性著作《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也在1958年三联书店重印。再如张荫麟《中国史纲》、缪钺《读史存稿》、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等著作，均得到陆续出版。

还有罗福颐《印章概述》、王治秋《琉璃厂史话》、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等杂书，罗福颐在书中赞扬他的父亲罗振玉对古印研究是“新的方法之一”。据《大事记》记载，王子野、范用十分重视此类“杂书”的出版，称之为“枕边书”“软书”，打算每年出一两种，不仅亲拟选题如《古代理人的姓氏、名号和避讳》《新茶经》《梅兰芳》《齐白石》《民间节日杂谈》等，而且

不遗余力地美化这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用五号仿宋排印，天地宽，行距稀，版本很讲究。他们还请邓拓审读《印章概述》书稿，邓拓阅后复信说：“这本小书还是目前所需要的。”

四是“专家治社”，据《大事记》记载：一九五五年三月人民出版社范用等人提出的第一批六十六个特约审稿人，如王惠德、于光远、王宗一、许立群、陈翰伯、姚溱、黎澍、翦伯赞、冯友兰、汤用彤、向达、刘大年、顾颉刚等。一九六一年十月王子野请翦伯赞来出版社内讲座，讲述“让步政策”“论从史出”“历史主义”等观点。王子野极力赞扬翦伯赞的讲座，要大家向他“学习”。他说：“翦老上了很好的一课……”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翦老就是传金针来的。”在翦伯赞的这次讲座前后，来社内讲座的还有金灿然、陈翰伯、胡绳、戴逸、吕振羽、管大同、许涤新、白寿彝、彭明等许多专家，当时还准备邀约吴晗等来讲座。

1961年末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补订本》在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初王子野提出编辑《史学丛刊》，介绍上世纪30年代的史学成就，宣传“新观点史学家”，聘请吕振羽为主编或顾问。范用等人提出，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著作“为《史学丛刊》树起了样板”，还主张把目录送邓拓、黎澍、翦伯赞、田家英、吴泽、薛暮桥等征求意见，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范用说：“这套丛刊的作用，主要是反映新史学的探索、开拓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内容可以有两个方面：一、选印曾经有过比较大影响的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二、编印重要论战的文章。”1962年9月范用给陈原写信说：“我们有一个打算，即有选择地出一批史学界知名学者的著作，除了陈垣，还有陈寅恪、顾颉刚等人，每人一本，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信中还特别赞扬陈垣的著作“是唯物主义的”。陈原复信对此表示赞赏，并说中华书局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陈原还说：“总之，这是一件未了愿望。”范用、陈原等人的这一策划，在此至1965年为止，出版此类文集近十种。

邻水李家的四重历史折叠

刘逸南

一本家族纪事集的背后，藏着中国百年转型的基因图谱。《百年家事》是由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撰写的“家族纪事集”，以四川邻水李家四代人为棱镜：从晚清实业家李征庸、水师提督李准，到清华大学教授李相崇，再到如今作为出版人的李昕，纵贯百年风云。

李昕在开篇即写道：“这不敢称家族史，只是家庭纪事集。”这位曾推出《巨流河》等重磅作品的编辑大家，深谙历史书写的意义。他抛弃宏大叙事，选择“人物侧写”的拼图式结构。“我只写决定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事件，写这些事件与时代的关系。”全书仅聚焦5位核心人物，用20万字钩沉命运浮沉。“关键亮点”写作法成为破题密钥。对曾祖父李征庸，抓住其作为官员兼实业家在第一次广州起义中的矛盾抉择；对伯祖父李准，锁定他勘定

南海、收复东沙群岛的壮举与身处清末乱局的挣扎；对父亲李相崇，聚焦清华园知识分子的精神咏叹；对自己，则坦陈癌症经历与大学梦。这种“去全景化”书写，恰如历史学家雷颐在序言所指：“碎片化的家族记忆，固置于集体记忆场域而获得整体性意义。”个体的抉择瞬间折射出时代的棱角。

李家四代恰似中国近代化的四组基因片段：曾祖父李征庸作为晚清实业家，经历传统士绅向近代工商业者的转型。他督办四川矿务、创办过机器局。伯祖父李准是清末水师提督，也是书中最具戏剧性的历史枢纽人物。他率舰收复东沙群岛、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权，辛亥革命中“弃暗投明”易帜反清，其人生经历凸显出在新旧裂变中的生存智慧。父亲李相崇是清华大学教授，学院派的知识分子。

从留洋学者到共和国教授，书斋理想与现实激流的碰撞，构成一首“清华园里的咏叹调”。

出版人李昕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亲历者，其作书生涯恰逢文化开放的年代，而自述《吊诡人生——我的癌症故事》更将个体生命纳入历史无常的哲思。四代人构成一部微缩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史。李昕说得透彻：“百年家事显露于前，百年国事隐藏于后。”

书名虽为《百年家事》，立意却在破“家史崇拜”。李昕直言：“无意为前辈树碑立传”“不为尊者讳”。当写到曾祖父曾经镇压起义、伯祖父李准的政治摇摆时，史料呈现的冷峻超越家族情感。这种态度呼应学者郭世佑序言标题“直陈磨难，历史可期”。书中对祖母周毅家族的书写尤见深意——这位晚清总督千金，身后是显赫的安徽周氏家族，

但李昕仅以平常视角写其持家教子，刻意淡化门第光环。

“反思”是李昕强调的核心词：“反思自己，反思家族，反思百年历史。”当他把个人癌症经历纳入家族叙事时，疾病就成为历史无常的隐喻。

在历史学者雷颐看来，家族史的价值在于“抵抗集体记忆的格式化”。李昕的实践恰印证此道：以小叙事解构大历史，用边缘经验补充中心叙事。书中“附录：有关李准的几个疑问”，以考据形式还原被主流史述简化的复杂性。书中以情感记忆平衡史料实证：李昕写父亲弥留时“手指在虚空划着德文单词”，将一代学人的未竟理想凝于瞬间。这本325页的家族纪事，读者看到的不仅是邻水李家的悲欢离合，而且是四代人的跫音，已然汇入民族精神的永恒交响。



一饮一食见天真

李海卉

袁枚说：“凡事不可苟且，于饮食尤甚。”袁枚讲美食，集中在《随园食单》中。在他看来，人生百味，不过一席随园宴。《随园食单》风行两百年，谁解其中味？近日，林卫辉捧出了新鲜的《袁枚的讲究：趣读〈随园食单〉》。他结合《随园诗话》《随园全集》《小仓山房外集》《子不语》等，把袁枚藏在里面的饮食真味、宦海情味、人生况味都挖掘了出来。

研究中国饮食，袁枚的《随园食单》是绕不开的经典。它不只是食谱，更是清代文人的雅致生活范本。袁枚作为乾隆年间的诗坛领袖，也是历史上非常会吃的文人。他23岁中进士，为官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禄吏。33岁父亲去世，他辞官养母，隐居于南京小仓山，建了一座随园，集山水人文景观于一体，堪称生活美学的鼻祖。袁枚的随园餐桌，是文人雅士的“文化沙龙”。这里有获康熙御赐豆腐秘方的老龙臣，也有与之惺惺相惜的郑板桥……这些被《随园食单》带过的人名，在林卫辉的牵线下重新活色生香，构成一幅乾隆年间的社交浮世绘。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袁枚的讲究，冬瓜燕窝汤“以柔配柔、以清入清”，鳝鱼需“现杀现煮，现熟现吃”，卤鸭必先去骨……但他反对铺张浪费，在简单之余求精。随园的餐桌从来不止于味蕾，袁枚追求美味，却更看重饮食背后的情趣与境界。

蔡澜说：“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热情，其他的可以消失，但是热情不可以消失。”这是“不将就”的生活美学在中国饮食文化的缩影。蔡澜会称自己是“饕人，饕吃饕知识的人”。被问起成为美食家的奥秘，蔡澜说：“先得提高自己的独立思考，不管别人会不会吃，自己会吃就是了……有灵性的人，从食物中也能悟出道理。”

将林卫辉的解读放在饮食思想谱系中审视，更见其价值。《中庸》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生命真味，尽在一饮一食的淬炼间。袁枚戒火锅，蔡澜也盼火锅“从地球上消失”，表面看都是对饮食纯粹性的坚守，内里却藏着时代差异。袁枚的“戒”源于文人雅士对“万物各安其位”的秩序追求，而蔡澜的排斥则带着现代个体对标准化饮食的反抗。林卫辉精准捕捉到了这种差异。他指出袁枚的“不将就”带着士大夫的精神洁癖，斥火锅“对客喧腾已属可厌”，更批入夏粥“失粥正味”，还有他对“藏好水”的极致追求，本质是将生活艺术化。而蔡澜则更多体现了都市人的解压哲学，让美食慰藉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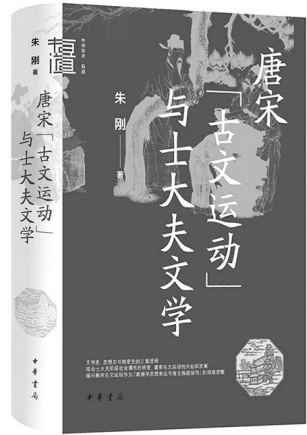
两种生活美学互补——袁枚代表的是农耕文明中“慢食”的精致，蔡澜体现的是消费社会里“快尝”的通透，而现代人需要的，或许正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蔡澜的豁达恰与袁枚的讲究共振，林卫辉做的，就是在这看似对立的姿态中，找到中国人对待食物的不变初心——那种“凡事不可苟且”的执拗，那种从舌尖悟人生的通透。

饮食之味，终是人生况味。“随园宴早已散场，但那股讲究的劲头儿，仍在每个热爱生活的人的舌尖流转。”现代人在大快朵颐时不忘细品滋味，在喧嚣纷扰中仍能坚守诗意，不妨活出几分随园风骨。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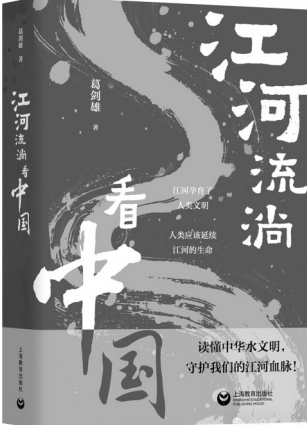
江河历史看过来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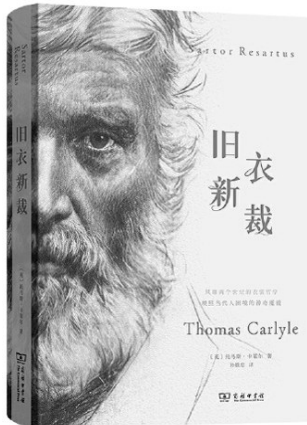
唐宋“古文运动”在文学史、思想史、儒学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书在对“古文运动”既往研究的框架与范式作出谱系式梳理的基础上，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此前、此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对古文运动重新定义，对其发展历程重作分期，新意盎然，胜义迭出。

《江河流淌看中国》 上海教育出版社



葛剑雄教授以江河湖海为脉络，系统梳理了水与中华文明发展的深刻联系。从黄河的根魂塑造、长江的文脉滋养、到运河的千年智慧、江南的水乡繁华，再到湖泊的生态价值、海洋的开放胸怀，全书以历史地理为视角，结合人文思考与当代关切，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水文明图景”。是一部关于水的史诗，揭示水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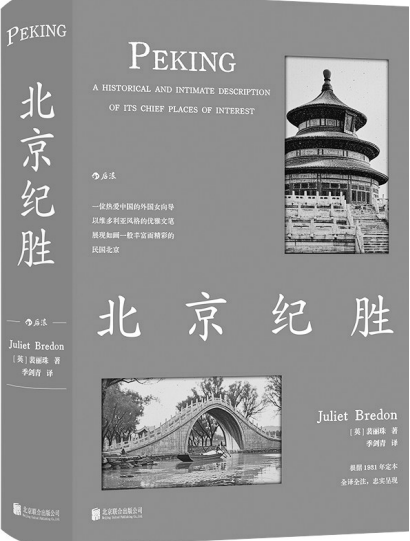
《旧衣新裁》 商务印书馆



该书是卡莱尔的精神自传，浓缩了他一生的思想精华。书中阐发的“衣裳哲学”既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也是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启示录。书中还展现了作者从虚无绝望的自我否定到精神觉醒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部现代人追求生命意义、探索存在本质的心灵成长史诗，对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与超验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京纪胜》：城市记忆的复调档案

胡书明



镀金般的京城暮色，或在水车河畔描绘“大理石栏杆间蜿蜒流淌”的如画景致时，建筑史、政治史与生活史已在空间坐标中融合。更为可贵的是，裴丽珠突破了静态的空间叙事框架。书中专设《过去的画意》一章，敏锐捕捉那些正在消逝的民俗场景：街头小贩抑扬顿挫的叫卖声如同“伦敦鱼贩或巴黎四季商人”的市声；打更人在夜色中的梆子声唤起“莎士比亚笔下道格勃里”的戏剧联想；清朝大臣的仪仗队行进被喻为“伦敦市长巡游”。这些类比既是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也意外保存了声音、动作与仪式的动态史料，使民俗学记录具备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特质。

尤为难得的是，裴丽珠对岁时节日的系统梳理填补了西方观察者的认知空白。她详述中元节河灯如星、冬至祭天等场景，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形成跨世纪呼应。当西方旅行者多聚焦于视觉奇观时，她却记录了时间循环中的生命节律——这种对时间维度的自觉书写，使《北京纪胜》超越了同期多数西方游记的平面化记述，构建起时空交织的立体城市档案。书中收录的几十幅地图、平面图及建筑剖面图，使文本具有了空间复原的实操性——当现代研究者试图重建民国初年北京城墙箭楼的形制时，这些图纸的价值甚至超过万言描述。这种图文互证的自觉意识，在当时西方中国学著作中实属

先驱。

“如画”作为全书核心审美范式，在1931年版《北京纪胜》中出现达49次。裴丽珠以此定义北京特质：“无处不在的如画氛围，与寻常事物的鲜明对比，新与旧的奇妙混合”。这是美学滤镜下的史料保存，这一维多利亚审美趣味的移植，成就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她对“画意”场景的筛选标准，意外保存了现代化浪潮前的北京生态。将西陵比作“金色雉鸡”的奇喻，对“驼背桥（玉带桥）倒影摇曳”的迷恋，本质上是在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那些被本土文人视为平常的景观，因被置于西方审美框架中获得凸显。

在当代译本中，季剑青使“如画”表述转化为可批判性阅读的史料。新版《北京纪胜》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季剑青基于1931年定本的深度译注工程。该版本不仅是裴丽珠生前最终修订版，新增紫禁城章及北海承光殿等内容，更通过三重学术介入，使原著完成从游记到研究底本的蜕变。800余条译注构成“平行文本”，如指出裴丽珠将“五塔寺原型误作印度菩提伽耶寺”（实为金刚宝座塔制式），同时补充该寺当代考古成果；按原著提到“前门夜市珠灯如星”，注释则考据《北京风俗类征》印证其规模。这种古今对话式注释，使文本成为流动的知识场域。正是通过这种学术转化，书中那些曾被“如画”滤镜柔化的

历史皱褶被重新展开，更能洞见文本中个人记忆与帝国叙事的博弈。译注本由此成为打开20世纪初中西权力关系的密钥。

裴丽珠的《北京纪胜》自1920年问世以来，便被林语堂誉为“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这一评价不仅源于其内容的广博，覆盖了北京的地理、建筑、民俗与历史，更在于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北京纪胜》恰在于它的不完美，反而真实呈现复调档案中的城市灵魂：裴丽珠既无法摆脱所谓的文化优越感，又对北京怀有真挚热爱；她哀叹传统消逝却无视底层苦难，又以人类学家的精确记录下市井百态。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复调书写，使文本超越个人游记，成为解码20世纪初北京的文化密码本。《北京纪胜》描绘古都“画意”，落笔时已听见推土机的轰鸣。这种记录与挽歌的双重性，恰是城市记忆最真实的温度。

季剑青的学术译注则赋予了这部经典当代生命力。通过版本校勘、史实修正与语境还原，他使裴丽珠的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历史资源。当我们在护封镂空处窥见着老照片中的“驼背桥”，或在译指引下比对当代卫星图中的城墙遗址，两个北京在书页间叠印——一个是裴丽珠挽留的“金色梦镜”，一个是浴火重生的现代都市。真正的史料价值不在完美叙事，而在诚实保存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叹息。